

全国中文核心期刊

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来源期刊

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期刊AMI综合评价(A刊)核心期刊

中文科技期刊数据库(全文版)收录期刊

RCCSE中国核心学术期刊(A)

2025. 5

VOL.18 NO.5

公共行政 评论

JPA
Journa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 论文

论全球治理的公共性及其构建

..... 丁 煌 吕嘉欣 1

议程驱动与行动赋能：政策创新扩散过程中的政府议题关注与官员特征

..... 周 健 张迎新 李智超 19

合法性压力与意义重构何以促进政策再创新：T 街道数字化转型案例研究

..... 凌佳亨 高鸿怡 42

“任务-技术”匹配视角下数字监督的适配机制及其成效：基于数字平台的多案例

比较研究 王 锐 史辰瑜 60

契约与关系双重治理机制如何影响外包治理绩效？

..... 童佩珊 朱春奎 郑 屿 79

制度互补：基层执法组织重构异质性的逻辑
..... 叶贵仁 胡冬梅 97

社会养老保险给付对子女生育决策的影响：基于对新农保养老金的考察
..... 郭 林 王 枫 117

行为助推工具的异质性效应：基于交互效应模型与机器学习算法的对比分析
..... 李 燕 陈文进 张书维 135

新型城镇化背景下房票安置模式评估与优化研究：基于智能体模拟的分析
..... 孙小梅 158

●理论综述

政策政体理论：理论溯源、分析框架与应用场景
..... 滕 蕾 王佃利 177

●英文目录与摘要 196

“任务-技术”匹配视角下数字监督的适配机制及其成效：基于数字平台的多案例比较研究

王 锐 史辰瑜 *

【摘要】数字平台的兴起深刻改变了权力监督机制的运行方式，然而已有研究难以超越数字赋能和技术驱动的叙事范畴。论文基于“任务-技术”匹配理论的分析视角，探讨数字监督在实践中的运行逻辑，通过多案例研究，重点分析数字平台技术特征与权力监督任务特征之间的适配机制。研究表明，数字监督的运行并非单纯的技术引入过程，而是技术与组织之间相互作用、持续适应与动态优化的过程；权力监督具有覆盖面广、专业性强和纵横协同密集的特征，而数字平台的信息整合、模块化和交互性特征能有效契合权力监督的任务需求；技术特征与任务特征之间的适配度越高，数字监督的效能越显著，具体体现为监督成本的降低、监督精准度的提升以及监督可持续性的增强。研究拓展了权力监督和数字治理领域的理论研究，旨在推动数字监督在具体情境中的优化与完善。

【关键词】权力监督 数字平台 “任务-技术”匹配模型 适配机制

【中图分类号】D6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2486 (2025) 05-0060-19

一、问题提出

权力监督机制的运行效能是衡量国家治理能力的重要标志。然而，由于信息不对称的广泛存在，传统科层组织往往难以获取下级组织权力运行的可靠信息，这使“不完全监督”（Imperfect Oversight）的困境成为研究者关注的核心议题（de Mesquita & Stephenson, 2007）。尤其在政策执行“神经末梢”的基层，

* 王锐，兰州大学管理学院教授。通讯作者：史辰瑜，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感谢匿名评审专家和编辑部对论文提出的建设性修改意见。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放管服’改革进程中全面实行政府权责清单制度的路径研究”（21CZZ027）。

权力运行呈现出覆盖面广、自由裁量权高、隐蔽性强等特点，如何消除权力监督中的真空地带，成为当务之急。近年来，随着新兴数字技术的快速发展，国家治理的形态和方式发生了深刻变革（米加宁等，2020）。为了打破传统监督模式的局限，我国在顶层设计中强调现代数字技术与权力监督机制的深度融合，各地掀起了以数字平台为驱动的权利监督模式创新浪潮，“智慧监督”“数字+纪检”“织密数字监督网”等新型模式不断涌现，极大拓展了基层数字监督的应用场景。

在各领域数字化建设快速推进的背景下，理论界关于数字监督与政府治理创新的研究与反思也日益增加。已有研究描绘了数字驱动和数字赋能背后的效率机制，认为不断更新迭代的数字平台重塑了组织内信息收集与传递的方式，有效促进跨部门、跨层级与多主体间的扁平化协同（舒绍福、苏江涛，2022），从而提高了政府的可问责性和透明度（Pina et al., 2007）。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学者强调，要对数字化建设的热潮进行“冷思考”，技术的发展虽然带来了新的机遇，但也伴随着不确定性和风险，可能引发“数字鸿沟”“算法黑箱”“数据伦理”“信息孤岛”以及“数字形式主义”等问题（Fink, 2018；王勇，2023；容志，2023；Peeters, 2023）。

既有研究关注数字技术在日常管理过程中的嵌入，并尝试使用“技术-组织-环境”模型（Technology-organization-environment Model, TOE）来解释技术采纳的复杂性（Baker, 2011）。然而，该模型主要用于解释组织层面相对静态的技术采纳决策，对于技术在管理实践中的动态运行效果关注不足。数字技术的应用需要考虑是否真正契合任务需求，而不仅仅是受组织或环境因素的推动。相较于 TOE 模型，“任务-技术”匹配模型（Task-technology Fit Model, TTF）更关注技术采纳后的实际效果，即技术与任务的适配程度如何影响组织绩效。基于数字监督平台的多案例比较分析，本文试图回答以下问题：在实际治理场景中，数字平台技术特征与权力监督任务特征的适配性如何影响监督效果？

本文基于“任务-技术”匹配理论的分析视角，探讨数字监督在实践中的运行逻辑。通过对数字监督平台的案例进行比较，重点考察数字平台的技术特征与权力监督任务特征之间的适配性。研究发现，权力监督有着覆盖面广、专业性强，并需要纵横协同的特征，数字平台的信息整合、模块化和交互性特征恰能有效契合权力监督的需求。任务与技术的适配性直接影响监督的有效性，具体体现在降低监督成本、提高监督精准性及增强监督可持续性三个方面。本文拓展了权力监督和数字治理领域的理论研究，并围绕权力监督任务的复杂性与数字技术的适配性提出了可检验的研究命题。

二、文献综述与分析框架

（一）国家的“可读性”与数字监督

权力监督作为国家治理中的一项制度性安排，其在实践中面临的最大挑战在于如何获取权力运行的完整信息。随着组织规模的扩大和等级链条的延长，信息不对称的问题日益突出，从而对监督的有效性提出更高要求。Scott（1998）提出了“国家可读性”（State Legibility）的概念，论证了不同国家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如何试图通过简化与标准化手段，使复杂多样的社会现象更易于被理解和管理。这种国家的“可读性”不仅体现在国家与社会的互动过程，也反映在国家内部自上而下的监督与问责体系中，尤其涉及信息的获取、传递与应用（孟天广、郑思尧，2023）。

当前，数字空间的全面发展深度正在重塑政府的监督方式。信息技术通过弥补组织漏洞、规范组织行为、追查异常活动以及预防腐败等方式，全方位多流程地提升了权力监督的力度与反腐绩效，从而推动权力的规范化行使（董石桃，2019）。在技术赋能的理念下，数字技术为权力监督的智能化转型提供了两类主要的技术支撑：一方面，通过大规模记录、采集和分析权力运行轨迹的数据，以识别腐败风险（过勇、杨小葵，2016），从而使公权力的运行建立在权责明晰化、标准化与可问责性之上；另一方面，利用数字化技术建构交互式监督平台，将各类监督主体纳入多元开放的监督结构，有效降低权力监督成本，促进信息共享，打破信息壁垒（陈朋，2019）。

随着对数字监督研究的不断深化，学界主要从以下三种理论视角探讨其实践效果。一是技术主导论，认为技术是监督转型的核心驱动力，技术本身的属性对组织绩效产生主导性影响。例如，Zhu等（2024）指出，大数据技术为所有政策利益相关者构建了一个“信息共享域”，并通过“数据—信息—知识”的转化链，推动了数字监督在扶贫领域的有效应用。二是组织适应论，主张组织并非被动接受技术，而是基于组织特征和环境进行策略性调整。数字技术通常被视为廉政建设的有效工具，但研究者通过跨国比较分析，认为技术应用取决于国家治理环境（Bajestani & Gharagozloo，2024）。基于“监督一点通”为个案分析，王法硕和张桓朋（2025）用“敏捷调适”的分析框架解释了数字监督平台的运行机制，认为地方政府通过系统整合、多层响应机制以及公众参与等策略，使数字平台有效满足市民需求。三是“技术—组织”互构论，该视角抛弃了“技术—组织”二重性的宏大理论叙事，认为技术与组织关系是技术供给和技术

使用之间相互建构的过程。例如，黄其松等（2020）借助贵阳市公安交通管理局“数据铁笼”案例，发现权力监督领域的大数据技术应用，与政府组织结构调整和流程再造互为前提、互为条件。

虽然技术主导论、组织适应论和“技术-组织”互构论为分析数字监督的运行和效果提供了有价值的理论视角，但已有研究也存在一些局限性。首先，无论是技术主导论还是组织适应论，均单方面关注技术采纳取得成功或失败的因素，低估了政府实践的复杂性。其次，尽管互构论从整合性框架探讨技术和组织之间的关系，但缺乏清晰的因果关系，组织如何通过新兴数字技术优化监督效果的路径并不明确。因此，关于数字监督的理论研究尚存在较大空间，迫切需要超越技术和组织二分的理论框架。本文引入“任务-技术”匹配模型，旨在弥补现有研究在任务需求和技术应用匹配方面的不足，从技术特征与权力监督任务特征出发，深入挖掘数字监督的运行与适配机制，并基于经验材料对其进行验证。

（二）分析框架

Goodhue 和 Thompson（1995）提出的“任务-技术”匹配模型是解释技术应用的经典框架之一，旨在通过研究技术与用户任务或需求的匹配度来阐明技术在实际应用中的有效性。该模型包括五个构成要素：任务特征、技术特征、“任务-技术”匹配度、技术利用和绩效影响。其中，任务特征和技术特征反映了技术及其应用的具体层面，而任务和技术匹配程度则捕捉了个人对“任务-技术”匹配的感知。基于此，“任务-技术”匹配模型提出了三个命题：首先，用户对“任务-技术”匹配度的评价由任务特征和技术特征共同决定；其次，个体对信息系统的使用取决于感知的匹配度；最后，个体对任务与技术匹配度的积极评价不仅能预测技术利用率，还能对绩效产生积极影响。“任务-技术”匹配模型的优势在于对技术采纳和应用方面具有较强的解释力，但仍需要适当修正，以更好地解释数字监督的运行与适配机制。因此，本文通过区分并对应任务特征和技术特征，将“任务-技术”匹配进行概念化，进而构建一个数字监督的整合性解释框架（见图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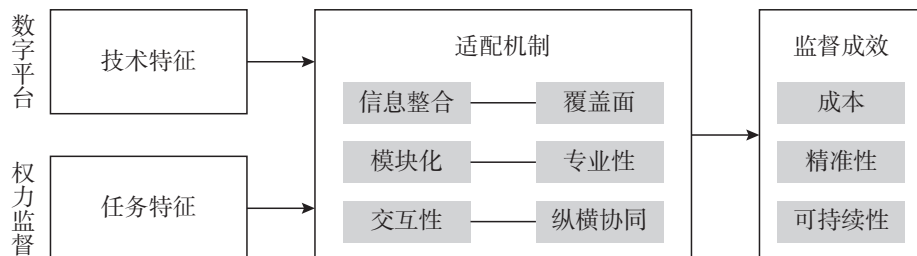


图1 分析框架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1. 技术特征

技术特征是指技术本身所具有的属性或功能。作为一种新型数字基础设施,数字平台不仅承担着汇集数据资源的“存储”功能,还具有较高使用频率的“连接-协调”功能,其使用频率要高于“指挥-控制”的功能(Tilson et al., 2010)。数字平台的技术特征包括以下三个维度:(1) 信息整合。数字平台的应用领域非常广泛,相对于传统的管理模式,数字平台能够打破时间和空间障碍,将多种来源的信息整合起来,从而降低搜索和使用信息的成本。(2) 模块化。数字平台可根据组织职责范围和业务流程设计功能互补的模块,并通过模块的排列组合形成一个完整的平台中心。(3) 交互性。数字平台依据用户角色进行权限分配,其交互性能突破组织边界,确保多主体之间实现及时的互动沟通与信息共享。

2. 任务特征

作为一项基本的制度设计,权力监督发挥着纠正行为偏差和提升执行效率的双重功能,同时蕴含着政治逻辑和效率逻辑。权力监督的任务特征包括以下三个维度:(1) 覆盖面。权力监督涵盖对“人”的监督与对“事”的监督,监督对象包括所有行使公权力的人员,监督事项则包括政府决策、人事任免、项目管理、资金使用等内容。(2) 专业性。由于权力运行涉及多个领域,权力监督工作需要依托扎实的专业知识和丰富的监督经验,以形成对监督对象的有效约束。(3) 纵向与横向协同。权力监督涉及多元监督主体间的互动,需要不同部门或群体之间实现共享信息、整合资源与协同行动,以提升监督效率,同时降低信息搜集、追踪与验证的成本。

3. “任务-技术”的适配机制

“任务-技术”匹配作为一个抽象概念,具有多种表现形式。已有研究主要形成两类衡量方式(Dishaw & Strong, 2005):一是作为轮廓偏离的匹配(Fit as Profile Deviation),即通过衡量实际情况与理想情况之间的偏离程度来评估匹配性。该衡量方式认为,任务需求和技术特征之间存在一个最优组合,偏离这个理想配置会降低绩效。二是作为调节的匹配(Fit as Moderation),这一方法将匹配视为调节变量,多用于问卷研究,假设技术对绩效的影响取决于“任务-技术”匹配的程度。

本文采用第一类衡量方式,将适配机制概念化为任务需求与技术能力的一致性,即技术能否满足监督任务的核心需求。在数字监督的场景下,权力监督任务特征与数字平台技术特征间的适配标准可以从以下三个核心标准来衡量:一是技术的信息整合能力是否能满足监督的广泛覆盖需求;二是技术是否具备

足够的智能化和分析能力，使其模块化特征可以支持监督的专业性；三是技术的交互性是否能有效支持多方协同监督。

4. 对监督成效的影响

当技术特征与任务特征之间的适配度较高时，数字监督机制能发挥实质性影响，从而以最少的资源投入达到最佳的监督成效。具体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降低监督成本。数字技术的自动化流程能够整合不同渠道的数据，从而减少传统监督方式对人力、物力和时间的消耗，提高监督效率。二是提升监督精准性。新兴数字技术具备识别和预测潜在廉政风险的能力，有助于弥补因专业壁垒导致的监督盲区，从而增强监督的针对性与有效性。三是增强监督可持续性。数字监督平台依托多主体协同参与，能推动监督体系的适应性变革，并通过反馈机制不断优化监督模式，促进监督体系的长期稳定运行。

三、研究设计

（一）研究方法

多案例研究是一种用于探究现象成因及运行机制的定性研究方法，在各领域得到了广泛应用。相较于单案例研究对个案的细致挖掘，多案例研究更侧重于逻辑的复制验证，强调案例间的比较。本文采用多案例比较研究方法，主要基于以下三点考虑。首先，本研究在多案例研究中兼顾比较逻辑与复制逻辑，不仅关注不同案例间的差异，同时强调在多个案例中相互印证，以提高研究结论的稳健性。其次，数字监督平台的类别多元，其运行涉及的利益相关方和组织环境也存在较大差异，多案例研究可以突破现象与背景的界限，以理解各要素之间的复杂关系，识别潜在的因果机制。最后，多案例研究通过整合访谈、参与式观察、历史资料分析等方法，能形成更全面的证据链，从而减少单一数据来源可能带来的偏差。

（二）案例选取

根据 Yin（2003）的观点，案例研究的目标在于归纳理论，而非统计推断。本研究的案例选择主要基于典型性原则，选取了当前实践中较为常见的三类数字监督平台作为案例，分别是专项监督平台（G 省乡村振兴监督信息平台）、业务监督平台（A 国企数智纪检平台）和综合监督平台（Y 市党员干部违法信息交互平台）。需要指出的是，尽管这些案例均依托数字平台开展监督，但其背后的制度背景各具特色，包括治理结构、业务流程、历史脉络及运行机制等方面

的差异。

基于案例研究的三角验证法，本研究通过以下三个渠道获取了大量经验材料：一是深度访谈。本研究于2021年3月至2023年7月对上述三个平台运行相关的工作人员及使用对象进行了半结构式访谈。二是历史文献资料。本研究系统梳理了三个数字监督平台建设过程中相关的设计方案、政策文件、工作报告等资料，以补充和印证深度访谈的内容。三是公开资料。本研究借助社交媒体和新闻报道以全面了解其实际运行情况。

案例一是关于G省乡村振兴监督信息平台的运行情况。G省纪委监委于2017年底开始筹建数字监督平台，2019年7月，G省扶贫（民生）领域监督信息平台经过3个月试运行后正式上线，并在全省推行。2022年，将平台升级为乡村振兴监督信息平台，成为一个集合查询、互动、分析、管理、监督于一体的智能化平台。该平台由G省纪委监委主推，外包公司提供技术支持，整合乡村振兴领域的各类资金数据，并公开相关的资金和项目管理信息，处理群众投诉举报的各类问题。本案例调研共访谈了13位受访者，包括平台技术支持公司的项目经理、使用数字平台开展监督的公职人员以及社会公众，访谈内容累计约4.4万字。

案例二是关于A国企数智纪检平台的运行情况。基于数字共享的原则，2020年，国有企业A按照“试点先行、探索经验、稳步推广”的原则，开始搭建数智纪检平台，该平台以容器方式运行在云平台上，实现了资源快速交付、资源弹性伸缩、服务快速发布，构建了实时数据监督场景。自2022年以来，该国企开始陆续向下属公司发布智慧监督系统建设运行管理办法，明确了系统有关模块的录入工作要求。该平台利用大数据开展“靠企吃企”、围标串标、违规经办企业等领域的风险排查、问题识别以及问责追责，并利用创新模块孵化的方式丰富监督信息化应用场景。本案例调研共访谈了22位受访者，包括A国企纪委、审计、财务、人力资源等部门工作人员，访谈内容累计约8.3万字。

案例三是关于Y市党员干部违法信息交互平台的运行情况。2016年Y市提出了运用现代科技助力监督执纪的思路，经过一年的试点，2017年9月，该平台开始在全市范围内推广应用。截至2019年2月，Y市纪委充分发挥市委反腐败协调小组的职能作用，整合信息资源，将全市所有党员、公职人员、市属国有企业中层以上干部信息共33.5万余条纳入平台中心数据库。该平台的原理是通过自动比对违法党员和监察对象案件信息，架起纪律审查与司法裁判、行政处罚的“连通桥”。本案例调研共访谈了21位受访者，涉及Y市C区（市辖区）纪委监委的纪检监察干部，以及区人民政府职能部门的工作人员，访谈内容累计约12.1万字。

基于案例中的各类资料，本文从以下两个维度分析数字监督的适配机制：（1）纵向适配机制的差异。在同一案例内部，本文从数字监督平台的基本原理和实际运行情况出发，纵向比较技术特征与任务特征在三个维度的匹配情况，以解释其动态适应过程。（2）横向案例间的比较。围绕具体的维度，本文综合评估不同数字监督平台技术特征和权力监督任务特征间在匹配程度上的差异，以探讨不同制度环境中的适配机制。

四、案例分析：数字监督的适配机制

在探讨数字监督的运行与适配机制时，本文通过多案例比较分析（见表1），揭示技术与组织相互作用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并分析这种适配性在不同背景下的具体表现。数字监督的实践运行并非简单地引入数字技术，而是一个数字平台技术特征与权力监督任务特征不断适应和动态调整的过程。

表 1 数字监督的多案例比较

特征内容			案例一：G 省乡村振兴 监督信息平台	案例二：A 国企 数智纪检平台	案例三：Y 市党员干部 违法信息交互平台
维度一	任务特征	覆盖面	惠民资金项目	监督全场景	党员干部管理
	技术特征	信息整合	群众投诉信息收集	数据中台	中心数据库
维度二	任务特征	专业性	资金预审和风险预警	关键业务领域	纪法衔接
	技术特征	模块化	前后两个应用服务端	监督主题孵化	对比分析和自动推送
维度三	任务特征	纵横协同	政民互动	纵向协同	横向协同
	技术特征	交互性	交互式平台	共享式平台	共享式平台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调研资料整理。

（一）案例一：乡村振兴监督信息平台

1. 基于惠民资金“全覆盖”的投诉信息收集

自 2015 年我国正式实施精准扶贫政策以来，大量资源和政策向 G 省倾斜，扶贫资金是脱贫攻坚的保障，也是腐败和作风问题多发的重点领域。针对基层监督“点多面广”的特点，乡村振兴监督信息平台整合了两类信息：一是惠民惠农资金数据。该平台整合了财政、民政、水利、教育、林业、残联等部门资金项目的数据，社会公众可在手机或电脑中按身份证、部门、区划三种查询方式，了解惠民惠农财政补贴资金和项目的发布情况。二是投诉举报信息。如果

群众对每一笔资金发放的情况有问题或疑惑，可点击“一键举报”，针对扶贫资金使用、项目管理、贫困识别和退出、驻村帮扶等方面的问题进行在线投诉举报（见图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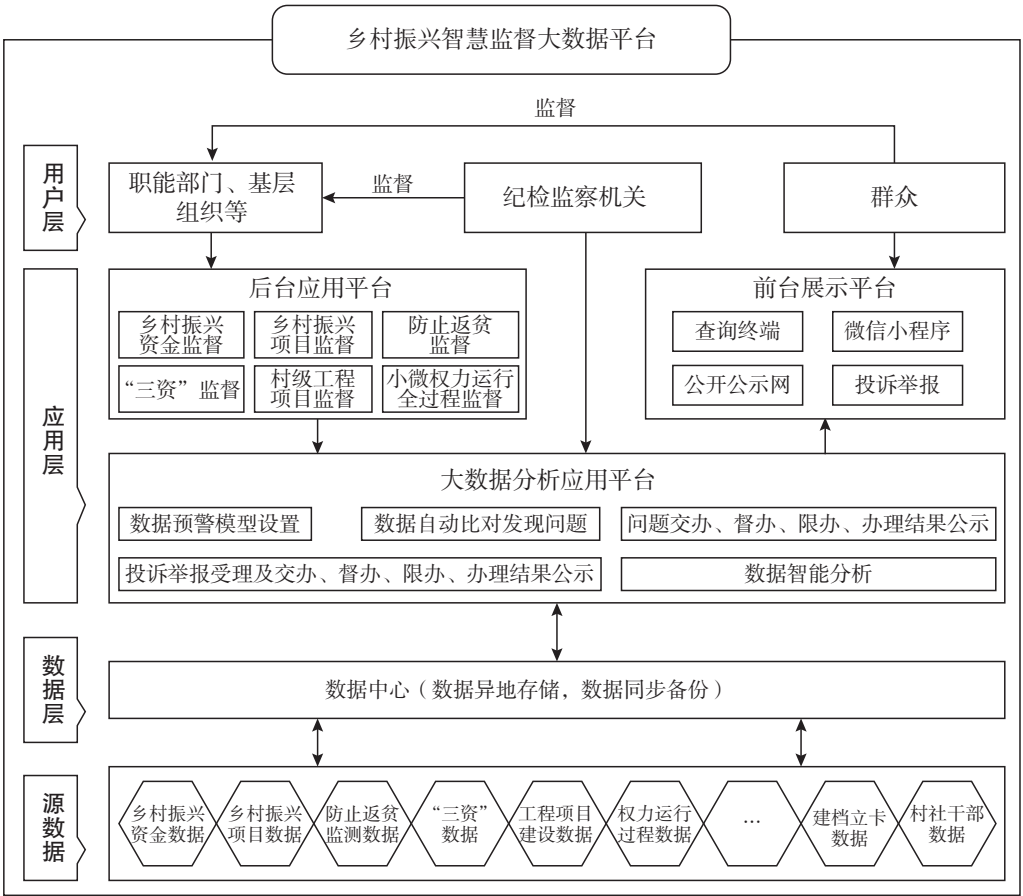


图2 乡村振兴智慧监督大数据平台框架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调研资料整理。

G省通过整合各类数据信息，基本实现了对民生领域项目资金监督的“全覆盖”。截至2025年3月，该平台覆盖人数达到2920.18万人，涉及到户资金4327.09亿元、项目资金2025.78亿元，累计访问次数达到5.84亿次。作为一个专项监督平台，G省乡村振兴监督信息平台在宏观上整合了全省范围乡村振兴领域的资金管理、项目落地等相关信息，在微观上将数据颗粒度精细到个体的每一笔资金发放和投诉举报信息。然而，在数字平台的应用推广过程中，数据录入工作主要由各地职能部门负责完成，常出现突击录入、实时更新滞后以及数据规范性不足等问题，给后续监督工作造成了不利影响。G省J市A县A乡镇工作人员说道：

“之前，我们各乡镇、各相关部门单位的分管领导和负责监督信息平台业务的工作人员参加了培训，但这个平台的录入工作量的确比较大，如果分管领导安排督促少，业务人员再操作不细致，出错的信息一放到平台上，群众的投诉量也就上来了。”（访谈资料 XZF20210621）^①

2. 基于前后服务端的专业性分析

乡村振兴监督信息平台主要依靠信息公开来实现社会监督，由前端和后端两个应用服务端组成。前端对村级“三资”（即资金、资产、资源）、“三务”（即党务、村务、财务）、工程项目建设数据进行公开公示，接受群众查询、监督和投诉举报。根据投诉数量分析，G省纪委监委发现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医疗保险、低保以及冬春生活救助资金，这四项资金领域违规问题多发，于是在2021年开启了为期6个月的专项监督整治，核查平台反馈的疑似问题34.8万个，核实群众投诉举报1995件，查处违纪违规问题28件，共涉及44人，追缴违纪违规资金约2.13亿元。从结果来看，数字平台的投诉举报模块拓宽了纪检监察机关获取问题线索的渠道，对资金发放和项目实施起到了结果控制的作用。

后端综合运用多种数据分析算法构建数据预警模型，以实现对相关数据的预警检测、关联分析及智能化处理。此外，后端的模块设计专门为基层单位开通了“资格预审”功能，可基于房产车辆信息、工商注册信息、公职人员信息等一系列基础信息，比对分析后综合研判出一些重点领域、关键环节以及廉政风险点。负责该监督平台技术支持公司的项目经理向我们介绍：

“这个平台的后台建立预警数据中心，它通过我们对接的数据，会主动预警发现问题，然后它的预警模型会直接预警到某一个人、某一件事情上，再通过平台直接推送出来，纪委可以通过平台直接对预警的问题进行核查，最后通过这个平台回复，达成一个整个闭环的管理，这个是全周期的。”（访谈资料 JSGS20230801）

然而，在实际运行过程中，资金预审机制落实不力和预警机制失效的难题却摆在基层管理人员面前。根据G省各地关于信息平台推广应用情况通报，多个区域预审频次较低，较少在资金发放前借助数字平台预审享受相关政策人员的资格，未能发挥平台前筛功能。而且，部分县（市、区）纪委监委未按照要求设置比对规则，在资金发放后没能及时进行识别与核查，未能发挥平台后筛功能。例如，2020年5月6日之前，G省D市所有资金全部设置为“不参与比对”，该问题也在全省范围内被通报批评。

^① 访谈材料编码规则：受访者单位代码（大写字母）+访谈日期。

3. 基于交互式平台的“政民互动”

作为典型的交互性平台，乡村振兴监督信息平台设计之初的定位就是促进线上“政民互动”。平台将纪检监察机关、基层行业部门和群众整合到数字空间，通过降低参与、沟通和互动成本，畅通群众监督渠道，在平台上形成受理、转办、办理、审核、答复、评价的完整链条。基层纪委工作人员向我们介绍了该平台投诉举报的处理流程。

“这个平台是省纪委牵头来做的，资金、项目、政策信息由我们县一级录入。群众如果觉得资金发放有问题，直接可以一键投诉。因为投诉的时候是根据资金类别来投诉的，平台收到投诉信件后，会自动发到县一级的部门处理，像民政局、扶贫办、人社局这些部门，他们核实情况以后，在系统里填写回复。我们纪委主要是督促这些部门核查问题线索，如果有涉及违纪违法的，我们会跟进处理。”（访谈资料 XJW20210621）

（二）案例二：数智纪检平台

1. 基于数据中台的监督全场景覆盖

2016年，案例二的所在行业提出“云大物移”的概念，随后逐步形成“云大物移智链边”的概念，旨在以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移动互联网、人工智能、区块链、边缘计算等先进数字科学技术，提高电力系统信息化工作。在此背景下，A 国企数智纪检平台利用数据中台实现与人资系统、企业资源计划（Enterprise Resource Planning, ERP）系统、财务管控系统等其他专业系统之间的互联互通，调取 23 个业务系统数据，并汇入“天眼查”等外部数据资源，建立“数据资产”目录。并且，A 国企数智纪检平台运用数据管理和分析平台 DataQ、大数据开发治理平台 DataWorks 等管理组件来建立纪检核心数据库。负责对接数智纪检平台建设项目的工作人员向我们介绍：

“权力运行过程产生海量数据，全部靠人力监督很难实现，我们这个纪检数智管理的理念主要是为了全场景覆盖，监督对象从职能部门延伸至乡镇业务所，监督数据可以穿透至专业管理底层。”（访谈资料 JJGS20230721）

2. 基于数字主题孵化的业务监督

数智纪检工作平台包括智慧监督、廉洁档案、纪律审查、生态研判、考核评价、履责纪实、巡视巡察、学习平台八个模块。从功能上来看，平台集合了监督执纪问责业务办理、风险在线监测、政治生态智慧研判等功能。除此之外，平台使用海量数据在线分析工具 QuickBI、帆软报表开发工具 FineReport 等工具，以及开发数据可视化分析、业务数据探查、报表制作等功能，快速灵活响应业

务需求，实现数据资产化运营、体系化运作。在智慧监督模块下，A 国企自 2021 年开始针对多发频发的廉洁风险点，以监督主题孵化的方式，搭建了 18 个监督场景，涉及人、财、物、营销、后勤、项目等 6 个关键领域。

以“挪用电费资金廉洁风险”主题为例，2021 年 12 月，平台监测到异常交费数据，基于自训练（Self-training）的机器学习算法，通过实时监控 POS 机刷卡方式交费记录，识别出交费卡号与电费催收人员的工资卡卡号相同的交费记录，并匹配员工所在单位和收费单位信息。基于算法预警，纪检人员随即开展线下核查，对潜在的违规事实进行甄别与认定。该平台可以满足专业监督的要求，故预警规则算法被推送至数据中台，为其他专业智慧场景应用提供参考（见图 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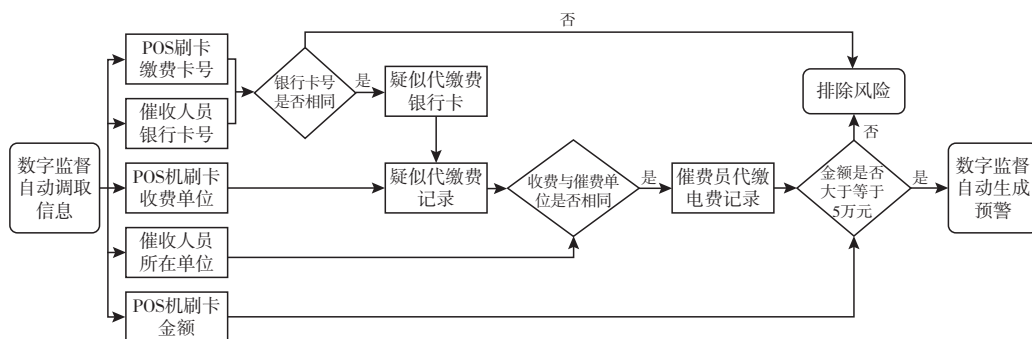


图 3 预警规则逻辑框架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调研资料整理。

3. 基于共享式平台的问题核实、整改与反馈

在案例二中，A 国企建立了“五责一体”协同机制，主要涉及企业党委、纪委、承担党务工作的职能部门、业务部门、基层各级党组织等五类责任主体的联动。在日常管理过程中，各类监督主体主要依靠每个季度开展联席会议的方式进行协同，领导班子通过集体议事的方式，调度、安排和研究各类问题。虽然数智纪检工作平台的运行是基于数据中台的业务、人资、财务等数据，但由于平台使用权限存在差异，尚未在平台中形成横向部门间的协同监督机制。横向部门间的协同监督仍以问题线索移送和联席会议的方式为主。

在资源共享式平台的模式下，纵向层级间的协同监督主要有两种方式：一是根据监督平台发现的廉政风险点，纪委监委下发纪律检查建议书和监察建议书，由业务部门和基层党组织进行核实、整改与反馈。二是每年数智纪检工作平台会向基层单位征集智慧监督信息主题并进行孵化，由纪委、基层单位人员、技术人员共同组成的孵化小组，完成需求编制、预警规则制订、监督主题评审、数据溯源、线上模型构建等工作。

（三）案例三：党员干部违法信息交互平台

1. 基于中心数据库的干部监督

“纪法贯通”是权力监督领域的重点和难点，其核心在于纪检监察机关既要审查党员干部涉嫌违纪问题，又要调查公职人员涉及职务违法和职务犯罪的行为。实践中，由于地域管辖差异、部门信息沟通不畅以及当事人刻意隐瞒等问题，纪检监察机关需要耗费大量时间获取党员干部违法问题的线索，尤其是在司法机关和行政执法机关未能及时移送的情况下，纪律审查、司法裁判与行政处罚之间衔接不畅的难题就会凸显。

与案例一和案例二中监督平台不同的是，党员干部违法信息交互平台是对“人”的监督。2012年和2016年，S省两次作为全国试点单位，分别启动纪检监察业务综合信息系统和监督执纪问责信息管理系统项目建设。在省级层面的总体规划下，S省Y市于2017年搭建了党员干部违法信息交互平台，将全市所有党员、公职人员、市属国有企业中层以上干部等人员相关信息纳入平台中心数据库。依托电子政务外网，司法机关、行政执法机关会在下达刑事判决或行政处罚决定15个工作日内，将涉及党员干部违法的信息向纪检监察机关推送。根据官方信息显示，平台于2020年已成功连接市县两级共402个司法、行政处罚单位，中心数据库收录党员干部信息33.5万余条。

2. 基于对比分析和自动推送的纪法衔接

党员干部违法信息交互平台的系统框架包括平台服务模块、数据分析模块、数据存储模块、数据处理模块、数据整合模块。其中，平台服务模块的功能在于实现大规模数据对比和问题线索自动推送。根据人员信息，交互平台与数据中心的数据可进行自动比对甄别，自动显示人员类型，并根据干部管理权限，自动转入对应纪检监察机关受理。数据分析模块则关注问题线索移送的“后半篇文章”，借助统计分析对特定时段、领域、违法情形进行预警，为纪检监察机关提供决策依据。

相较于以往的人工移送方式，交互平台显著提升了司法机关和行政执法单位的问题线索移送效率。此过程无须电话沟通或当面衔接，所有操作均可在线完成。然而，我们也发现，尽管交互平台提高了问题线索的传输能力，却未能有效改善纪法衔接过程中的专业性问题。其中比较典型的情况是，在处理同时涉及违反党纪和涉嫌违法犯罪的案件时，需要解决如何合理运用纪律和法律这“两把尺子”的问题，以确保党纪政务处分与行政处罚、刑事处罚能有效衔接，从而确保执纪执法的规范性与高效性。

3. 基于共享式平台的横向协同

我国的权力监督体系强调要以党内监督为主导，促进各类监督贯通协调，这意味着，权力监督需要借助跨部门、多元主体的资源来提高监督效能。尽管党员干部违法信息交互平台旨在构建各类监督主体间的协同机制，但在实际运行中，该平台作为典型的信息共享平台，核心功能是将多个层级的纪检监察机关、司法机关、行政执法机关所掌握的数据整合在一起，实现信息的互通，避免“信息孤岛”现象。在案例三中，围绕党员干部的违法信息，以数字平台驱动的协同监督方式仍以单向为主，即由司法机关和行政执法机关向纪检监察机关移送问题线索，就目前运行情况而言，该数字平台尚无法满足多主体的互动协同需求。正如工作人员向我们介绍的：

“按照已有协作配合的制度和机制，就像我刚才讲的，我们的党员干部违法信息交互平台是能完成常规移送工作。有些信息它不能常规移送，它有可能涉及几个单位或者几种情形，有时候要进行集中研判，那么就要专项分送。”（访谈资料 SJW20220307）

五、数字监督的成效分析

新兴技术正在深刻影响着公共部门的管理模式，尤其在数字监督领域，数字平台显著推动了权力监督的广度与深度。然而，现实情境往往更加复杂，数字平台不仅发挥着“数字赋能”和“数字驱动”的作用，其运行过程中还可能伴随“数字形式主义”“数字增负”“数字悬浮”等问题。从“任务-技术”匹配的视角来看，技术特征与任务特征的有效适配能够提升监督效果，反之，则可能削弱其实际作用。数字监督的多案例比较情况总结如表 2 所示。

表 2 数字监督的多案例比较

监督成效	案例一：G 省乡村振兴	案例二：A 国企数智	案例三：Y 市党员干部
	监督信息平台	纪检平台	违法信息交互平台
降低监督成本	中	高	低
提高监督精准性	低	高	中
提升监督可持续性	高	中	低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调研资料整理。

（一）“任务-技术” 适配度对监督成本的影响

技术的信息整合能力能否适配监督的广泛覆盖特征，将直接影响监督成本

的高低。数字技术为组织赋能的核心在于降低组织中的信息不对称，这为权力监督的数字化转型带来了新的契机。数字平台从技术和组织层面推动权力监督的数字化改革，借助算法、接口技术内嵌于平台的运行机制，任何用户在平台上的操作都会被其以统一标识符进行编码，不断赋予平台掌管用户的“中间权力”（单勇，2022），从而扩大监督范围，实现监督精细化管理。在三个案例中，数智纪检平台依托业务中台的数据支撑，实现对日常工作痕迹的全面记录，覆盖面最广。而乡村振兴监督信息平台则侧重于对政策资金流向的监督，重点关注资金分配和执行情况，覆盖范围相对集中。党员干部违法信息交互平台作为干部管理平台，所涉及的数据较少，只能支撑有限的监督任务。

（二）“任务-技术”适配度对监督精准性的影响

权力监督具有较强的专业性要求，数字平台的模块化特征能否匹配这一需求，直接关系到监督的精准性。权力监督任务的专业性强，要求数字平台能针对不同的监督领域和任务实现定制化服务。宋锴业（2020）通过深入调研J市政务平台建设，提出政府平台具备功能互补模块、灵活调试分工以及频繁密度反馈的组织特点。模块化设计允许平台根据监督任务的具体要求进行灵活地定制和扩展，确保平台可以有效支持复杂且高度专业化的监督工作。在三个案例中，数智纪检平台在这一方面表现突出，通过模块化设计，平台可以根据不同的监督需求快速孵化创新模块，确保监督任务在执行过程中能够得到专门的技术支持。党员干部违法信息交互平台专注于违法信息的交换与处理，具有较高的专业性。相比之下，乡村振兴信息平台则主要承担社会公众投诉举报的收集工作，需要进一步核实问题的真实性和具体情况，以确保监督的精准性与有效性。

（三）“任务-技术”适配度对监督可持续性的影响

监督体系的可持续性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多方协同的有效性，而技术的交互性在其中起到关键作用。数字平台并不拘泥于工具属性，信息公开、多元协同及监督绩效等一系列流程，塑造了数字政府的新型组织逻辑。数字平台实现业务流程在专业部门的准确分工，为监督部门与公众的直接对接搭建沟通桥梁。此外，平台运作的反馈程度和监管强度呈显著正比关系，公众广泛参与和各级政府高密度检查，推动了平台运行过程的及时反馈，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监督的信息不对称难题。在三个案例中，乡村振兴监督信息平台在交互性上展现出较强的优势，不仅涵盖了政民互动，还实现了横向部门之间的协同与信息共享。相比之下，数智纪检平台具备实时数据更新和信息共享的特点，但在横向跨部

门的协作上仍存在一定不足，未能完全实现各部门间的高效联动。而党员干部违法信息交互平台的交互性最为薄弱，仅停留在数据共通的层面，缺乏深层次的交互和协同机制。

六、结论与讨论

（一）研究发现

为揭示数字化监督高效运行的适配机制，本文在结合数字平台研究和权力监督理论的基础上，立足“任务-技术”匹配度模型，重点关注数字平台和权力监督特征之间的并列式匹配程度及其成效。通过对专项监督平台、业务监督平台和综合监督平台开展多案例研究，本文认为：（1）数字监督不仅仅是简单的技术引入，而是技术与组织之间相互作用、持续适配的动态过程，组织不仅要根据其现有的治理结构和管理模式选择适配的数字技术，同时，技术的引入也会反向影响并塑造组织的治理结构与管理模式。（2）任务与技术的适配机制体现在覆盖面与信息整合、专业性与模块化，以及纵横协同与交互性三方面的一致性。（3）任务与技术的适配度越高，数字监督的成效越显著，具体表现为监督成本的降低、监督精准性的提升以及监督可持续性的增强。

本文超越了数字赋能和技术驱动的叙事范畴，为数字监督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本文的贡献之一在于将“任务-技术”匹配理论与监督实践相结合，分析了数字监督平台如何通过技术与任务的适配影响监督成效。基于多案例研究，本文揭示了数字平台技术特征与权力监督任务特征之间的复杂互动过程。本文的第二个贡献在于对监督成效进行多维度划分，并构建了适配度与监督成效之间的关系，为未来数字监督平台的设计与优化提供了理论依据。

（二）数字监督的限度

作为一种外源性技术，数字平台在支撑原有权力监督工作的过程中，必然会经历适应性阶段。尽管数字平台提升了组织对权力运行信息的记录、存储和传输效率，但其对组织的信息分析能力以及形成多元主体间的协同互动作用尚不明显，“数字形式主义”“数字增负”“数字悬浮”等问题依然存在，亟须从组织和制度层面加以干预。

1. 技术支持：重数据挖掘轻数据分析

当前，在快速推进全流程、全要素的数字纪检监察体系的背景下，我国数字化转型的下沉落地仍处于初期攻坚克难的阶段。以本文关注的三个数字平台

为例，虽然新兴技术的融入提升了纪检监察机关的信息收集和整合能力，但是，数据源和数据分析方式方面存在的不足会极大影响数字监督的可靠性和精准性。

第一，大规模数据采集的技术难题。在缺乏统一标准的数据目录的情况下，当前数字监督平台同时存在人工数据填报和智能数据采集两种方式。然而实践中，两类数据采集方式往往存在不同步、不兼容的问题，特别是当平台需要手动输入数据时，由于工作量过大且缺乏数据审查工具，组织就会面临数据失真和技术增负的问题。除此之外，过度冗余的信息会增加组织成本，最后转嫁到基层干部和社会公众身上。

第二，数据分析的支撑工具不足。权力运行轨迹的数据体量庞大，形式多样，且有不同的数据源。当前数字监督平台主要依据数据比对和阈值设定的方式来发现问题线索，无法满足规模大、来源杂、格式异的多源数据分析需求。在实际操作中，由于数字监督平台的使用人员缺乏专业的数据分析知识和技能，大量的数据无法为监督工作提供支撑。

第三，算法“黑箱”和算法偏差的挑战。由于技术本身的复杂性，外部人员并不清楚数字监督平台算法的目标和意图，也无从获悉算法从输入到输出的基本逻辑，这导致算法在应用中没有得到有效的规制。除此之外，程序代码、指标体系、转化格式、输出内容等技术标准由平台主导层级政府或部门来确立，在这种情况下，因算法设置偏差导致的监督不精准问题也成为当前数字平台运行的难点问题。

2. 组织基础：线上线下监督机制的脱嵌

平台正迅速成为创造新价值的基础，有效的平台是以卓越的技术为基础，但不能只停留在技术领域。因为平台的运转同样依赖跨部门、跨层级、多元监督主体的支持、协同和反馈，而这需要组织层面的管理来进行统筹。随着数字平台的广泛应用，一个困扰科层组织的现象日益凸显，即线上监督机制与线下监督机制存在脱嵌现象。这一现象最终造成的非预期后果是，组织有偏差的管理手段和管理方式可能会抑制数字监督的有效实施。

第一，线下层级监督与线上扁平式管理的适配问题。随着数字技术的发展，基层实践不断探索通过数字平台来构建扁平化的监督模式，以实现信息快速流动、资源共享和监督响应的高效化。这种线上平台强调跨层级、跨领域的开放性，推动党内监督与各类监督在渠道上实现贯通协调，使监督主体呈现多元化、互动性和协同性的特征。然而，线上扁平监督与线下层级监督之间仍存在衔接不足的问题。当两者未能形成有机整合时，数字化监督的成效往往会打折扣，甚至出现“线上热闹、线下乏力”的局面。亟须建立更为顺畅的沟通与协调机制，优化基于数字平台的正式与非正式互动渠道，从而真正实现监督体系的立

体化、全链条运行。

第二，实质创新与目标替代的矛盾。战略选择理论的观点认为，战略是一个过程，我们不能只局限于技术的实施，而是要全方位考虑技术应用背后的组织要素，包括组织拟解决的核心问题、技术方案的识别以及不同资源的配置。然而在实践中，如何借助数字监督开展实质性创新仍是一个难题。在没有充足组织资源支持的情况下，数字监督实施过程中的目标替代问题就会显现。例如，片面强调数字创新而忽视组织发展需要，这种为了创新而创新的技术误用、滥用，会对其他工作产生“挤出效应”，最终造成重投入轻应用、重建设轻维护的现象。

第三，实施手段与改革目标的不匹配。综观顶层设计中关于数字纪检监察体系的目标，重点在于关注权力运行的全流程和全要素，从现代行政过程论的视角来看，这实际上涵盖了权力运行的“上游”（决策、政策规则制定等方面）、“中游”（政策传达、资源分配等方面）和“下游”（政策执行、公共服务等方面）。但在实践中，数字监督平台更多关心对权力运行的“中下游”进行规制，但在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背景下，公共部门承担的决策权恰恰是影响政治经济社会发展的核心要素。因此，数字监督同样需要关注从源头到末梢的权力监督。

综上所述，数字化监督的演进并非一蹴而就，而是一个持续适配和动态调整的过程。数字技术的引入并不会自动优化监督实践，而是需要根据监督任务的需求不断进行调整和优化。未来研究应进一步关注技术与组织的深度互动，探讨数字监督对权力结构的影响，以及其可能引发的算法透明性与公平性问题。

参考文献

- 陈朋 (2019). 大数据赋能的政治生态监测预警——邳州市实践探索的经验启示. 探索, (2): 76-83.
- Chen, P. (2019). Political Ecological Monitoring and Early Warning with Big Data Empowerment: Experience and Enlightenment of Pizhou's Practical Exploration. *Probe*, (2): 76-83. (in Chinese)
- 董石桃 (2019). 技术执行视域中的大数据反腐：情境、结构与绩效. 行政论坛, 26(6): 14-22.
- Dong, S. T. (2019). Big Data Anti-Corrup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echnology Execution: Context, Structure and Performance. *Administrative Tribune*, 26(6): 14-22. (in Chinese)
- 过勇、杨小葵 (2016). 基于大数据的领导干部廉政监督机制研究. 国家行政学院学报, (6): 22-27.
- Guo, Y., & Yang, X. K. (2016). Anti-Corruption and Supervision System Research under the Context of Big Data Analysis. *Journal of Chinese Academy of Governance*, (6): 22-27. (in Chinese)
- 黄其松、邱龙云、胡贇栋 (2020). 大数据作用于权力监督的案例研究——以贵阳市公安交通管理局“数据铁笼”为例. 公共管理学报, 17(3): 24-36.
- Huang, Q. S., Qiu, L. Y., & Hu, G. D. (2020). Case Study of the Power Supervision Which Big Data Acts On: Take the Case of “Data Cage” in Guiyang Public Security Traffic Authority. *Journal of Public Management*, 17(3): 24-36. (in Chinese)
- 孟天广、郑思尧 (2023). 国家治理的信息理论：信息政治学的理论视角. 政治学研究, (6): 117-130.
- Meng, T. G. & Zheng, S. Y. (2023). Information Theory of State: The Theoretical Perspective on Politics of Information. *CASS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6): 117-130. (in Chinese)
- 米加宁、章昌平、李大宇、徐磊 (2020). “数字空间”政府及其研究纲领——第四次工业革命引致的政府形态变革. 公共管理学报, 17(1): 1-17.

- Mi, J. N., Zhang, C. P., Li, D. Y., & Xu, L. (2020). "Digital Space Government" Research Program: Government Reforming Caused by the Fourth Industrial Revolution. *Journal of Public Management*, 17(1): 1-17. (in Chinese)
- 容志 (2023). 技术赋能治理的异化风险及其防控. 人民论坛, (3): 60-63.
- Rong, Z. (2023). The Risk of Alienation in Technology-Enabled Governance and Its Prevention and Control. *People's Tribune*, (3): 60-63. (in Chinese)
- 单勇 (2022). 数字平台与犯罪治理转型. 社会学研究, 37(4): 45-68.
- Shan, Y. (2022). Digital Platforms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Crime Governance. *Sociological Studies*, 37(4): 45-68. (in Chinese)
- 舒绍福、苏江涛 (2022). 数字赋能国家监察: 特征、问题与推进. 电子政务, (10): 99-109.
- Shu, S. F., & Su, J. T. (2022). Digital Empowerment of National Supervision: Characteristics, Challenges, and Advancements. *E-Government*, (10): 99-109. (in Chinese)
- 宋锴业 (2020). 中国平台组织发展与政府组织转型——基于政务平台运作的分析. 管理世界, 36(11): 172-194.
- Song, K. Y. (2020). The Development of Platform Organizations in China and Transition of Government Organization: An Analysis Based on the Operation of Government Affairs Platform. *Journal of Management World*, 36(11): 172-194. (in Chinese)
- 王法硕、张桓朋 (2025). 敏捷调适: 数字化平台何以赋能共同生产——基于 K 市“监督一点通”平台的案例研究. 公共管理学报, 22(3): 117-131.
- Wang, F. S., & Zhang, H. P. (2025). Agile Adaptation: How Digital Platforms Empower Coproduction? A Case Study of K City's "One Click" Platform. *Journal of Public Management*, 22(3): 117-131. (in Chinese)
- 王勇 (2023). “点到”即可“为止”? ——数字监督下乡的治理情境、效应及张力. 电子政务, (9): 77-89.
- Wang, Y. (2023). "Just the Right Touch"? Governance Context, Effects, and Tensions of Digital Supervision in Rural Areas. *E-Government*, (9): 77-89. (in Chinese)
- Bajestani, M. F., Gharagozloo, M. M. M., & Li, S. (2024). Digital Technologies: Anti or Pro Corruption?. *Journal of Global Information Technology Management*, 27(3): 182-199.
- Baker, J. (2011). The Technology-Organization-Environment Framework. *Information Systems Theory: Explaining and Predicting Our Digital Society*, 1: 231-245.
- de Mesquita, E. B., & Stephenson, M. C. (2007). Regulatory Quality under Imperfect Oversight.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101(3): 605-620.
- Dishaw, M. T., & Strong, D. M. (2005). Examining Multiple Dimensions of Task-Technology Fit. *Proceedings of the Eleventh Americas Conference on Information Systems*, 2403-2413.
- Fink, K. (2018). Opening the Government's Black Boxes: Freedom of Information and Algorithmic Accountability. *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 Society*, 21(10): 1453-1471.
- Goodhue, D. L., & Thompson, R. L. (1995). Task-Technology Fit and Individual Performance. *MIS Quarterly*, 2: 213-236.
- Peeters R. (2023). Digital Administrative Burdens: An Agenda for Analyzing the Citizen Experience of Digital Bureaucratic Encounters. *Perspectives on Public Management and Governance*, 6(1): 7-13.
- Pina, V., Torres, L., & Royo, S. (2007). Are ICTs Improving Transparency and Accountability in the EU Regional and Local Governments? An Empirical Study. *Public Administration*, 85(2): 449-472.
- Scott, J. C. (1998). *Seeing Like a State: How Certain Schemes to Improve the Human Condition Have Failed*. New Have: Yale University Press.
- Tilson, D., Lyytinen, K., & Sørensen, C. (2010). Research Commentary—Digital Infrastructures: The Missing IS Research Agenda. *Information Systems Research*, 21(4): 748-759.
- Yin, R. K. (2003). *Case Study Research: Design and Methods (3rd ed.)*. Thousand Oaks: Sage Publications.
- Zhu, J., Xiao, H., & Wu, B. (2024). From Big Data to Higher Bureaucratic Capacity: Poverty Alleviation in China. *Public Administration*, 102(1): 61-78.

责任编辑: 张雪帆

英文目录与摘要

JPA Journa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Vol. 18 No. 5, 2025

●ARTICLES

The Publicity of Global Governance and Its Construction Huang Ding & Jiaxin Lyu

Abstract Publicness is not only the external goa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search, but also the internal attribute of public management discipline. China's state governance system is the superstructure of socialist public ownership of the means of production, which makes China have a unique practical logic of publicness, and profoundly affects the outline of China's participation in global governance. When studying how to build a theory for all countries, including China, to jointly self-demonstrate their publicness in participating in global governance, the paper takes publicness as the context and sorts out the historical evolution and logical relationship of global publicness, global political publicness and global governance publicness. With the advent of the era of digital intelligence driven by generativ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nd computing power, global publicity is further enhanced, and the improvement of global political publicness is characterized by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pattern from hegemonic power as the substantive authority to the United Nations as the public authority, providing political potential energy for the publicness of global governance, and promoting the global governance system to establish a "people's view of history" in response to "who's motivation". In solving the problem of "how to motivate", a demonstration path of preventing falling into the "self-demonstration trap", transcending the hegemonic "solitary demonstration cycle" and practicing "common self-demonstration" is opened up. A global public authority with a growing public character and a China that embraces it can achieve a win-win situation. A China that upholds the authority of the United Nations and diverse actors that also recognize the authority of the United Nations can create a win-win situation.

Key Words Global Governance; Public Administration; Publicness; The United Nations

Agenda Driven and Action Empowerment: Government Issue Attention and Official Characteristics in Policy Diffusion Jian Zhou, Yingxin Zhang & Zhichao Li

Abstract Government organizations and individual officials play a critical role in shaping policies. However, their specific roles in policy diffusion require further theoretical elaboration and empirical validation. Based on attention allocation theory and the theory of policy entrepreneurship, this study constructs an "agenda-driven and action-empowered" analytical framework to explore the roles of government's issue attention and individual characteristics of officials in policy diffusion. Using government data governance agencies as a case study, this research employs survival data from 283 prefecture-level and above cities between 2015 and 2023 and conducts empirical tests using the discrete-time event history analysis method. The findings indicate the following: (1) Local government's attention to specific policy issues promotes policy diffusion in the relevant field, validating the agenda-driven mechanism; (2) Officials' capabilities (such as work experience) enhance policy diffusion, while their political relationships (such as ties with central authorities) inhibit policy innovation diffusion, partially validating the action-empowered mechanism; (3) Officials' capabilities significantly reinforce the positive effects of government's issue attention, whereas their political relationships do not

show any strengthening effect on government's issue attention. By revealing the complex interactions between government's issue attention and officials' characteristics, this study provides new insights into the understanding of policy diffusion, contributing to the deepening and expansion of the theoretical framework.

Key Words Policy Diffusion; Agenda Driven; Action Empowerment; Government Issue Attention; Official Characteristics

How Legitimacy Pressure and Sense Remaking Boost Policy Reinvention: A Case Study of Digital Transformation in T Street Jiaheng Ling & Hongyi Gao

Abstract Policy diffusion in local governments can be manifested as either symbolic adoption or policy reinvention. Existing studies mainly explain the symbolic adoption of local government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legitimacy pressure, but there is still a lack of systematic explanation of how legitimacy pressure boost policy reinvention. Based on the theoretical “least likely” case of the reinvention of T Street's digital transformation policy, this study through the causal-process observation find that the key for local governments to choose policy strategies lies in sensemaking. Sensemaking in the policy process refers to the process in which local governments understand specific policies based on available information. In the early stage of policy diffusion, due to incomplete information, local governments have a deviation in the evaluation of the adaptation degree between their own resources and policy innovation conditions, and the relative advantages of innovation. In the later, legitimacy pressure is transformed into the resources of legitimacy, which opens the window of sense remaking and makes local governments re-evaluate the space of policy innovation. The core of sense remaking is that the key actors grasp the contingency factors, so that the local government can use the resources of legitimacy to seek force upward, not only to directly obtain financial resources, and strive for the policy promises. And homeopathic borrowing superior power, access to other local government between the remote learning opportunities; At the same time, cohesion, the realization of policy innovation risk sharing between higher and lower levels of government. After the sense remaking, the local government rediscovered the feasibility and value of policy reinvention and launched action. This study incorporates sensemaking into policy diffusion research, answers the question of how legitimacy pressure boost policy reinvention, and improves the understanding of local government policy initiative.

Key Words Sensemaking; Policy Diffusion; Policy Initiative; Policy Reinvention; Resources of Legitimacy

Adaptation Mechanisms and Effectiveness of Digital Supervision from a Task-Technology Fit Perspective: A Multi-Case Study of Digital Platforms Rui Wang & Chenyu Shi

Abstract The rise of digital platforms has significantly transformed power supervision mechanisms. However, much existing research remains focused on digital empowerment and technology-centric narratives. Drawing on task-technology fit theory, this study examines how digital supervision operates in practice. Using a multi-case comparative approach, it analyzes how the technological features of digital platforms adapt to the task requirements of power supervision. Findings reveal that digital supervision involves more than technology adoption—it is a dynamic process of interaction, continuous adaptation, and organizational optimization. Power supervision demands broad coverage, high specialization, and intensive collaboration across vertical and horizontal dimensions. In response, the information integration, modularity, and interactivity of digital platforms align well with these needs. The closer the fit between technology and task, the more effective the supervision—reflected in lower

costs, increased precision, and greater sustainability. This study advances theoretical insights into power supervision and digital governance and supports the practical enhancement of digital oversight in specific contexts.

Key Words Power Supervision; Digital Platforms; Task-technology Fit; Adaptation Mechanism

How Do Contractual and Relational Governance Mechanisms Affect Outsourcing Performances?

..... Peishan Tong, Chunkui Zhu & Yu Zheng

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contractual governance and relational governance have been extensively studied topics in the field of project management. However, quantitative research examining the alignment between these two governance mechanisms remains limited. This paper addresses this gap by developing a conceptual model that analyzes the impact of contractual and relational governance mechanisms on governance performance in outsourcing projects. Based on survey data, hierarchical regression, polynomial regression, and response surface analysis techniques are employed to delve into the mechanisms through which these dual governance mechanisms affect outsourcing governance performance. The study reveals that there are “support” and “compensation” mechanisms between contractual governance and relational governance, indicating a “complementary” relationship in their impact on outsourcing governance performance. Optimal performance is achieved under the “strong contract-strong relationship” governance model when both mechanisms are aligned, with governance efficacy increasing proportionally to the degree of alignment. In cases of non-alignment, the “high trust-low completeness” governance model yields better outsourcing governance performance. This paper enriches the related research on outsourcing project governance, provides empirical evidence for the relationship and strategic combination between contractual governance and relational governance, and offers clearer interpretive logic for outsourcing project governance.

Key Words Contractual Governance; Relational Governance; Outsourcing Performance

Institutional Complementarity: Logic of Heterogeneity Reconstruction of Grassroots Law Enforcement Organizations

Guiren Ye & Dongmei Hu

Abstract The key to comprehensive administrative law enforcement reform at the grassroots level lies in organizational restructuring, but the results of restructuring do not necessarily tend to be homogeneous. Drawing on an institutional-action analytical framework, this paper examines local governments that adopted strategies of policy compliance and policy adaptation to shape the logic of heterogeneity in organizational restructuring by multiple cases. It is found that under the same institutional arrangement, the heterogeneity of grassroots law enforcement organizational restructuring is influenced by three factors; historical orientation, legitimacy as the premise and effectiveness as the core. Specifically, institutional legacy constraints serve as the logical starting point for local governments to achieve heterogeneity in organizational restructuring, policy space grants behavioral legitimacy, and resource structure alignment ensures behavioral effectiveness. Historically distinct reforms, as institutional legacies, constitute exogenous complementarity, while policy space and resource structure, as policy and resource elements in organizational restructuring, form endogenous complementarity. Together, they create structural institutional complementarity, thereby driving heterogeneity in organizational restructuring. Notably, such heterogeneity is not a sign of governance failure but rather the empirical outcome of institutional system elasticity and localized resource embeddednes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stitutional complementarity, this research reveals how local governments strive to strike a balance between a unified system and effective governance, deepening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diversity

of local governments' responsive behaviors in administrative reforms and the heterogeneity of organizational restructuring. These findings enrich theoretical explanations of organizational behavioral logic.

Key Words Comprehensive Law Enforcement; Organizational Restructuring; Institutional Legacy; Policy Space; Resource Structure

The Impact of Social Pension Benefits on the Fertility Decisions of Offspring: An Examination Based on the New Rural Pension Scheme Lin Guo & Feng Wang

Abstract Using data from the China Family Panel Studies (CFPS), this paper empirically examines the impact of parental pension benefits, represented by the New Rural Pension Scheme (NRPS), on the fertility decisions of their adult children. The findings indicate that parental receipt of NRPS benefits significantly reduces the likelihood of childbearing among their adult children, with the probability of childbirth in the past year decreasing by an average of 3.4% to 10.7%. This effect is more pronounced in adult children living in rural areas. Mechanism analysis indicates that NRPS benefits reduce grandparents' involvement in intergenerational childcare, thereby weakening their role in sharing the costs of childrearing for the younger generation. Further analysis shows that the impact of NRPS receipt is especially significant for adult children whose parents live in communities without elderly care facilities and for those with relatively higher incomes. The study highlights the tension between the "defamilialization" of elder care and the persistent familization of childrearing responsibilities. The findings contribute to a deeper understanding of how pension systems influence individual fertility behavior and offers policy insights for improving the pension system and fostering a more fertility-friendly society.

Key Words New Rural Pension Scheme; Fertility Decisions; Family Grandparenting

Heterogeneous Effects of Nudge: Comparative Analysis Based on Interaction Effect Models and Machine Learning Algorithms Yan Li, Wenjin Chen & Shuwei Zhang

Abstract Analyzing the heterogeneous effects of nudges is highly valuable. This study reviews the research pathways, analytical frameworks, and evaluation methods related to the heterogeneous effects of nudges. Based on online experimental data from the context of "wedding hazing" governance, it uses interaction effect models and machine learning algorithms to identify potential heterogeneity factors of nudges and provides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the results.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1) Using interaction effect models alone to estimate the heterogeneous effects of nudge shows limitations. It is recommended to combine these models with machine learning algorithms, which can improve the accuracy in identifying the multiple heterogeneity effects and enable a more scientific evaluation. (2) Relying solely on main effects is inadequate for accurately measuring the effectiveness of nudges; therefore, addressing the multiple heterogeneous effects of behavioral interventions is crucial. (3) Integrating multidimensional heterogeneity variables in analyzing individual intervention effects is essential for developing a systematic understanding of the heterogeneous effects of nudge. In conclusion, to provide empirical evidence for the design and optimization of nudge, it is necessary to analyze the heterogeneous effects of nudge based on a three-dimensional analytical framework of "nudge type-individual characteristics-situational factors," integrating both theory-driven and data-driven evaluation paths, and considering a comprehensive set of characteristic factors.

Key Words Nudge; Heterogeneous Effects; Interaction Effect Model; Machine Learning; Multiple Heterogeneity

Evaluation and Optimization of Housing Voucher Resettlement Model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New Urbanization: An Analysis Based on Agent-Based Modeling Xiaomei Sun

Abstract The efficiency and effectiveness of resettlement in urban village redevelopment are pivotal for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the real estate and housing security sectors. Against the backdrop of new urbanization, the housing voucher resettlement model expands housing options for displaced residents, facilitates targeted inventory reduction for local governments, and alleviates fiscal pressures, thereby promoting a dynamic equilibrium between urban renewal and market vitality. This study adopts Guangzhou's housing voucher resettlement as a case study, extracting key variables from the current policy framework through semi-structured interviews and constructing an Agent-Based Model (ABM) by using NetLogo. The research investigates the equilibrium of the housing voucher market through eight computational simulation experiments, analyzing three dimensions: the macro policy environment, meso-level policy design, and micro-level target groups. It indicates that the initial quantity of housing vouchers exerts limited influence on the market, whereas factors such as the proportion of speculative vouchers, net benefits of vouchers, and growth thresholds are critical to market stability. Moderate government intervention enhances market stability, but excessive intervention may impair its self-regulating capacity. This study systematically examines the multidimensional influencing factors and dynamic interaction mechanisms of housing voucher resettlement policies, providing a theoretical framework for optimizing resettlement strategies. Policy recommendations include strengthening incentives in policy implementation and improving the transparency of voucher-related information.

Key Words Housing Voucher Resettlement; New Urbanization; Agent-Based Modeling; NetLogo

●THEORETICAL REVIEWS

Policy Regime Theory: Theoretical Origins, Analysis Framework and Application Scenario

..... Lei Teng & Dianli Wang

Abstract The emergence of boundary-spanning problem has increased the complexity of the policy process. In response to the limited explanatory power of existing policy process theories, scholars like Peter J. May have further developed the policy regime theory, emphasizing the need to collaborate across subsystem boundaries and solve governance challenges by building policy action communities, also known as policy regime. This theory encompasses three core elements: ideas, interests, and institutional arrangements, revealing how the policy action community influences policy outcomes, and it uses the legitimacy, coherence, and durability of policies as evaluation dimensions, providing standards for judging the strength of policy regimes and the effectiveness of policies. Currently, policy regime theory is widely applied in various policy contexts to analyze the process of policy change, clarify the logic of policy operations, explore the moderating role of policy feedback in the functioning of policy process, and reveal how policy regimes influence policy processes and politics. In terms of research methodology, existing studies primarily adopt case studies and content quantitative analysis, with some applying regression analysis. The research interests are diverse, contributing new insights to the field of policy science. This theory can be applied in China to analyze the dynamics of the policy process, research cross-border cooperation in public policy, assess and mitigate risks in policy reforms, and support the localization of theoretical research through empirical methods.

Key Words Policy Regime Theory; Policy Subsystem; Policy Feedback; Boundary-Spanning Problem; Cross-Border Cooperation

公共行政评论

双月刊, 2008年创刊
第18卷, 第5期(总第107期)
2025年10月15日出版

Journa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Bimonthly, Since 2008
Vol.18 No.5
Published in October 2025

主管单位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
主办单位 中山大学
协办单位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
中山大学中国公共管理研究中心
广东省行政管理学会

社长 肖滨

主编 朱亚鹏

联系电话 020-84113029 020-84038746

电子邮件 jpa.china@163.com

编辑出版 《公共行政评论》编辑部

(广州新港西路135号; 邮编510275)

印刷 广州一龙印刷有限公司

国内发行 广东省报刊发行局

国外发行 中国国际图书贸易总公司

(北京399信箱)

传真 020-84111478

网址 <http://jpa.sysu.edu.cn>

Administrator Ministry of Education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Sponsors Sun Yat-sen University

Supporters Centre for Chinese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search, Sun Yat-sen University
Guangdong Public Administration Society

President: Bin Xiao

Editor in Chief: Yapeng Zhu

Tel: 86 20 84113029 86 20 84038746

Fax: 86 20 84111478

Email: jpa.china@163.com

Website: <http://jpa.sysu.edu.cn>

Edited by Editorial Office of *Journa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NO.135 Xin Gang Xi Road, Guangzhou, China. 510275)

Distributed by China International Book Trading Corporation

(P.O.Box 399, Beijing, China)



刊号 ISSN1674-2486
CN44-1648/D

邮发 国内46-364
代号 国外BM8839

国内外公开发行人
国内定价: 20.00元

ISSN 1674-2486



9 771674 248258